

**Quan Qiu Hua He Zhuan Gui
Huan Xiang He Xian Shi**

(Globa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llusions and Reality)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by Ms. LIU Weihang

全球化和转轨

幻想和现实

科勒德克

概述

经济关系的全球化和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系统转轨是两个互相交织的过程，也是世纪之交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几十年来，全球化（也就是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市场真正融合为一个单一的全球化市场）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它势必将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如此，全球化的进程不会影响各国经济政策的走向，每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制订自己的经济政策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但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以及它们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也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与全球化不同的是，这股潮流很快就会结束，而全球化却是无止境的，正如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止境一样。基于此，也

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所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未来将会有更大的变革。

1、 永远的全球化

什么是全球化？有人认为早在几千年前全球化就开始了，随着货币的发明，贸易的出现，腓尼基人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了一起。现在看来，地中海贸易的逐渐扩张可能是全球化的第一个预兆，即使在新世纪，这种贸易扩张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不易受到太多自然障碍，如技术、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影响。在过去，由于山川、海洋、河流、森林等自然环境的阻隔，人们通常很难到达原材料供应市场、产品出售市场等；到了现在，贸易中存在的壁垒通常是技术水平和经济知识低下，以及缺乏政治敏锐等。人们通常是预测未来将发生什么事，而非明明白白地看到。今天，这种“可预见性”似乎有所提高，但是，对于 50 年或 100 年后的未来，人们仍然无法明了。

有人又认为随着人类文明的开始，全球化就开始了，因为千百年来，市场经济不仅仅持续“纵向深化”，同时也“横向扩张”。自从人类离开山洞（后来又离开村庄），到最终形成一个国家，市场始终是持续存在，而市场的经济行为也在不断进行，尽管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市场扩张行为。几千年前，技术以大约每年 3 英里的速度进行传播。今天，技术浪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全球，即使是技术落后的国家也能从新技术的快速传播中获得好处。

全球化贯穿了整个中世纪，著名旅行家、作家马可·波罗（1254-1324）是它的代表人物。尽管马可·波罗本人主要是对他到达的地方感兴趣（在那个时代，他认为是到达了世界的一个遥远的角落），但他的资助者却更加关注经济扩张、贸易发展以及资本所带来的最大回报。因此，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尽管当时没有人使用“全球化”这个说法，就象在封建主义时期没人使用“封建主

义”一词一样。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一个主要突破产生了，事实上，是偶然产生的。由于渴望打开其他市场，尤其是东方市场，如阿拉伯、中国、印度次大陆、马来群岛等，西方掀起了一股经济扩张浪潮。目的是通过减少运输时间、发现原材料及成品的新的来源来降低交易费用，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形成自己的进口市场。得益于这些经济行为，许多贸易中心变得越来越繁荣，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5个世纪前，新大陆的“发现”对全球化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由此形成了许多“新兴市场”，但最重要的是，全球化进入了它的第一个主要阶段—殖民主义阶段，这是全球化最黑暗的一面。殖民主义的幽灵仍然影响着美洲资本主义—奴隶制。由于整个新地区（如众所周知的非洲）进入了一种罕见的全球经济交流形式，人本身已经成为商品。

有意思的是，那些早期的“全球化”并没有明显促进人均收入增长，也没有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到了19世纪，绝对产量的增长速度还是非常缓慢，从人均产量来计算，在18世纪中叶，也就是在技术进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之前人均产量根本没有增长。据推测，200年前，西欧（那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的人均GDP约有1000美元（根据1990年物价标准），几乎是1000年前的两倍。到了1820年前后人均GDP有了较大的增长。目前，西欧（过去两个世纪来人口已增加了数倍）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8000美元。

经过1800年的时间，产量仅仅增加了3倍，在随后的200年间，产量几乎增长了10倍。由于经济扩张和市场融合所带来的经济文化利益的分配极度不均，一小部分受益者获得了最大的好处，而大多数人几乎没有机会享受全球化所带来的成果。今天，我们应该牢记这个事实，尽管历史永远不会重复自己，但在一定

程度上历史总是会重演的。

几个世纪来，世界人口增长非常缓慢，主要原因是由于生产的增长非常缓慢。直到最近，地球上的人口数量也几乎没有增长。公元初年的世界人口约有 3 亿，1000 年后这个数字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到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世界人口增长到了 5 亿。300 年后，世界人口数量达到了 10 亿，在后来的两个世纪，人口又增长了 50 亿。过去 50 年来，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世界人口数量翻了一番。在未来 50 年中——也就是到了 2050 年——世界人口可能会增长到大约 89 亿，而亚洲的人口增长将是最快的。

在遥远的过去，全球化无疑意味着文明的进程，但它也有黑暗的一面，如长达 3 个世纪的奴隶贸易、或者各殖民主义者为了利益冲突而进行的不计其数的武装冲突和帝国主义战争。今天，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打击国际毒品走私（顺便提及，这也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上都显示了很大的决心。可是，就是这些国家，在不久之前，为了占领“新兴市场”，奴役“新兴市场”的人民，竟强迫他们使用毒品，并不惜为此发动战争。19 世纪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在如今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经济全球化的第二个主要突破产生于 19 世纪，它带来的实质性变革丝毫不逊于如今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我们不应忘记，正是在那个时候——而不是现在——在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下（金本位制度确保了当时货币体系的稳定，但在 20 世纪新的货币体系放弃了金本位制），生产得到了快速增长，国际贸易也得到了很大发展。那个时期，全球化进程取得了实质性的新进展，这主要是由于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航海和铁路运输的发展、电报的发明、批量生产的成熟，这个时期已经与探索的时代完全不同了，技术和经济学成为人类新的开发领域。尽管人类

已经到达了所有的大陆和岛屿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新领域 ,但在新的经济扩张中 ,人们还是会有更伟大的发现 (在这点上我们并不是指外太空 , 至少现在还不是)。

然而 ,人类在 20 世纪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世界范围内大大小小的严重摩擦阻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事实证明 ,不管是社会主义 ,还是殖民主义 ,这两者的发展都是没有未来的 ,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都在进行系统转轨 ,而殖民主义仅在一代以后就土崩瓦解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否定它对文明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否认这一点 : 社会团结、对更平等分配的期望、以及通过政治途径对自由市场过度行为进行纠正的必要 , 这些都是应该加以保留的。

同样 ,殖民和新殖民主义所带来的经济独立后遗症还没有消失 ,只是在形式上有所变化。这也是解放过程中的一些团体、甚至整个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因素之一。

最后 ,如今正是全球化的第三个大的突破 ,全球化有了实质性进展。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时代 ,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全球化 ,尽管很少有人能对全球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因此 ,对全球化就有了很多种解释。在这里 ,我们认为**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开放的、完全融合的全球性商品和资本市场 ,并可形成有利于世界范围内生产、贸易扩张及资本流动的新的国际秩序。**同时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并且是迄今为止最大最基本的突破。因此 ,伴随着全球化所产生的变化确实有它的特殊性 ,也确实能对现实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的。

2、世纪之初的全球化

从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全球化不仅限于过去的几十年，今后仍要继续进行。因此有太多的事情未完成，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风险总是存在的，旧的政治或经济部门和对自由贸易和不受限制的国际贸易的障碍都将重新出现，或者出现新的部门或障碍阻止其发展。一百多年以前，一些人认为：所有的东西都被发明和创造完了，另一些人则相信：人类将不企求什么了，只企求和平和进步。世界经济的发展证明他们错了。那么我们现在希望什么呢？

任何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人首先必须解释当前全球化的进程的加速、加剧的原因，其规模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而且也复苏了一定的社会和思想上的，以及地区和国际间的冲突。全球化的动力依赖于三个因素，其有利的结构布局可以给全球化带来巨大的动力；相反，如果缺乏这些因素，在过去经常是这样，在将来也不可能排除，全球化会带来不全、缺陷，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失败的结果（例如，战争）。这些因素是：

- 技术进步的特征；
- 政治关系的成熟；
- 理论知识和实际经济技术的状况

现今，这三种因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着。很难准确地判断哪一个在全球化的进行中的作用更大。不同的作者对特定的因素有不同的评估，往往过分强调或低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可以肯定，只有这三个因素的合理结合才会导致世界范围全球化现在的程度、规模及统一的市场。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进行，它的发展，伴随着无处不影响人类活动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的突飞猛进。这一革命同时也包含生物技术和基因工程的进展，随着

它们的结果用于工业，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转化成新的规模生产技术。但是最大的革命性的发展是因特网的发展，它渐渐深入商业活动新的领域以及政治和文化相关的领域。因特网正改变着世界，因为它正改变着人们交流的方式。

这首先归功于信息的交流量，它戏剧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在 1860 年，越过大西洋发送两个字要化去相当于现在的 40 美元；如今，这些钱足以传送整个国会图书馆的藏书内容。从 1930 年至今，从伦敦打往纽约的电话费已降低了 1500 倍。从 1970 至今，计算能力所化的费用已降低了 99.999%，唯一的原因是，包含在计算费用里的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交易都转移到网上，包括“ B2B” 和“ B2C” 的，成本降低了，效率提高了，竞争给人们带来了好处，这是不可逆转的进程。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要达到规模效益，人们使用因特网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饱和。比方说电力，经济增长的一个标志，它完全用于制造业仅有 40 年。因特网传播则快得多，我们不必等待那么久。然而，即使是在美国，仅仅当计算机出现在近一半的家庭时，就发生了由因特网革命带来的“ 新经济”。在其它的国家，这样一种饱和程度则要花上一段时间，但进程是相当快的。互联网也很快延伸到其它目前技术不太先进的经济领域。

互联网在教育体制和研究方法上发挥了影响；它推动了管理和扩展了娱乐业。把它与电视相比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比喻——它更倾向于使用书写文字的能力。一个世纪以前，人被分成会读会写和文盲两大类，如今相同的区别中包含了有互联网知识及技能的和没有互联网能力的人。这是一个为高效和更好生活水平而战的领域。

互联网为所有的国家都提供了一个加速增长的机会，尽管对每个国家来说机

会的利用是不平等的，这就象 150 年前的铁路扩展一样，它带给每个人的机会都不是平等的。最需要的就是一个适当的基础设施和必需的机制。从发展的战略眼光来看，创造性地使用互联网需要发展政策的支持，因为它不是所谓的正在出现的“新经济”，而是一个新的——第四个——方面。

正如过去的农场和矿藏开采业，然后是制造业，随后出现服务业一样，现在是第四个方面。——互联网经济和现代信息技术覆盖了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将在 21 世纪起着重要作用。努力克服经济在传统因素当中的诸多问题的同时，时刻谨记着，将来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第四个因素。

互联网的革命和计算机网络的出现 — 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几乎无所不在，而在经济不太先进的国家的状况则显得差一些 —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远远超出了它应带来的改变。网络正在重新定义地球的大小。世界的大小，乃至可进入的市场，曾经都受地理和政治障碍的限制，现在再也不可能受阻了，那怕是亚马逊盆地和西藏。世界上不再有“遥不可及”的地方存在了。我们过去常常谈起“正在缩小的世界”，因为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运送货物，转移资金和传递信息的所需的时间缩短了。但是今天，相反地，世界已经“缩小”到一点了，然后又开始急速扩张。

在许多的商业活动中，距离障碍和与之相伴的费用已全都不存在了。廉价的网络通道可以在任何两地之间传输大量的数据，而其代价相对任何大宗交易来说可忽略不计。同样，它还可以提供一定形式的各种服务，和销售各种各样的产品——不仅是书籍和音乐，而且还有一系列的其它产品，从计算机软件到技术。

从这样看来，目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网络技术的爆炸，与其说是“缩小”了世界，还不如说引发了世界不可想象的扩张。互联网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角色与

五个世纪前发现美洲大陆一样，因为它用新的经济空间的扩展来丰富“旧的世界”，在那里可以做研究，投资获益，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采购和销售，贮存和消费，教授和学习，读和写。这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的改变和一个非常时期——在永久性全球进程中的第三个主要突破。大量的创造发明、企业家和人力资源、金融资本正朝虚拟的空间转移，在这里它们找到了一个无比优越的环境。

这种由许多幻想家和学者珍藏的、把外部空间看作是“探索时代”后的下一个大扩张的幻想并没有实现。但有可能成为现实。现在是一个**“虚拟扩张的时代”**。新的空间开拓了一个新的发展领域，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正如以前，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利用上一次的突破带来的机遇。真正获益的也将依赖后面两个决定当前全球化进程形式的因素——政治关系和经济技术知识。

单靠技术革命是不能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当然，后者可以克服物质上的障碍，从这一点来看，实际上，地球将不存在任何经济上不可触及的地域：从技术上说，地球上将不存在不能进行投资、生产、采购和销售的地区。但**还存在其他的障碍——政治和社会的差别，文化和思想上的差异，贸易和习俗的壁垒**。要消除和战胜这些，需要一个相适应的政策。同样，也是在这些领域，正发生着由技术进步推动的革命性的变化。

当前，特别是过去的二十五年，对待自由贸易和无管制的资本流动的政治态度也已发生转变。以前，在一方是真正社会主义，另一方是新殖民主义，不发达的国家认为贸易公司是一个第一世界对第二和第三世界资本剥削的工具。现在，出现了以全球合并形式的“单一”市场，同样的公司被看作是管理和市场领域技术交换和专业知识的**主要源头**，也是资本的供应场所。仅在1999年，与外资相关的国际资本流动的直接投资超过8000亿美元。

与以上相类似的，也存在大量的由金融中间商控制的，没有直接与这类公司有联系的自由资本流动。这些主要出现在最富有的国家，但资本也从发达国家流入新兴市场，偶尔也反方向流动。如果直接投资提高了竞争和增加了接受国的生产能力，当组合投资发挥作用时，情况就有可能不一样了。面对不成熟的机构和不完善的金融政策，组合投资的波动水平可能会加速地区的金融危机：1997年—1999年在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南美和俄罗斯出现的金融危机就是证明。

政治努力也推动了有深远意义的贸易自由化：单靠新技术的发展不足以取得这样的成绩。世界性的贸易量在过去二十年里已增长了六倍，它的扩张始终以很大的优势超出产量的全面增长。世界产量在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分别增长2.6%、3.4%和4.7%，而与之相比，贸易量的增长则分别为4.3%、5.1%和10.0%。2001年这两个方面的预计增长分别为4.2%和7.8%(IMF 20000亿)。如果这些预计准确的话，贸易量的平均增长将比四年期的产量增长（分别为6.9%和3.7%）超出1.9。

即便如此，自由贸易仍遇到许多障碍，同时也得到公共机构越来越多的支持。1994年的布鲁顿伍茨会议为刺激自由贸易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国际机构——那时只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成立。半个世纪之后，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了，对正在进行的国际商品和服务交流的自由化是一个新的推动。中国的加入，稍后俄罗斯的加入，其意义不仅是加速全球化进程，而且表明两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型，将给这一进程一个更大的推动。

最后，现代经济全球化的第三个催化剂是理论知识和实用经济技能的水平。知识不仅逐步形成，而且在吸收了大量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积累。人类在几个世纪的全球化过程中学到大量的知识，这些智慧现在都可以转化成优势，只要

技术加速这一进程，政治不能阻挡其发展。

国际化贸易的现代理论无疑证明，那些对外与外国经济接触，包括贸易，金融，资本流动方面，持更开放态度的经济制度有一个更好、更长远的发展潜力 (Crafts 2000)。另一方面，悬而未决的事是如何从一个相对较封闭 (不太开放) 的经济制度朝着与其它经济制度和全球体制相衔接的更自由化方向发展。最近几年的经验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常常被从反面提及，比如：贸易自由化的错误排序、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和在后社会主义国家 (Kolodko 2000c) 市场化建设导致的严重经济危机、机构改革不当促使资本自由流动、执行过程中没有必要的政策支持所带来的东南亚经济危机 (Chan-lau 和 Chen 2000)。一般来讲，多次出现的经济危机并不一定是由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带来的，政策的失误，尤其是在其它领域想利用开放和市场统一带来的优势而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的失败也是其中的原因。

问题是，在这一过程中，对自由化短期和长期结果知识的拥有全部集中在最富有的参与国。从有些经济落后国家角度来看，涉及全球化的经济知识以及以此作为一个促进发展的工具并没有给那些特别需要扩张的国家带来最大好处。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是发达国家。从这些国家到不同的国际机构 (它们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地区发展银行——他们的顾问不仅提供技术帮助和金融支援，而且进一步增加了最富裕国家的利益。这又是一个政治问题 (发生在全球的)，可能对经济思想产生障碍。因为经济学知道更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而能实际运用并生效的却不多。

3、区域化和全球市场

尽管在过去三十年，特别是在 90 年代，在全球资本移动和自由贸易扩张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而真正的全球化规模，也就说，存在于地区、国家和区域的市场要真正地统一为一个全世界范围的市场仍然有巨大空间。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是加紧区域间的合并。市场首先主要是在相邻国之间组合，考虑到自然原料和销售渠道的相同，运输和贮存成本低廉，也包括一般传统和文化的相似性，如语言的一致或至少是相似。

一方面，如果这些合并没有出现，通常是由于政治原因，如美国和古巴，希腊和南斯拉夫，或最极端的南北朝鲜。在我们欧洲地区，邻近国家的贸易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爱沙尼亚和俄罗斯，或更明显现的，白俄罗斯和波兰。如果两个邻国之间的贸易量没有超过各自国家进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一时，则确实有些奇怪。

另一方面，市场合并有时可能在两个地理距离相隔甚远的伙伴国之间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如新西兰和新加坡，他们之间最近已达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或是美国和智利，已经在相同的方向发展了。这些是相当少的例子，但是在将来可能会成倍增长。

这些涉及地理距离相隔甚远、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合并的例子，如澳大利亚和萨摩亚群岛，或者，经济差异甚远，但由于空间相邻和在相同组织的成员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如马来西亚和柬埔寨，表明区域合并(或双边关系加强)不一定完全依赖于产量水平或体制制度的相似。问题是，合并以各种形式出现。相应地，积累成本和利益也会在国内和超国家范围的特殊阶层和社会/职业集团之间进行分配。但是，如果要避免在完全合并后上升的社会差异，则需要相同的发展水平和合理的统一体制方法。因此，在合并过程起作用的不是从一开始的平等

发展水平 ,因为在一个平等进程上的运作 ,明显比在欠发达地区获得的增长要快。问题是使这一加速也对较富裕的伙伴产生利益 ,否则他们将对涉及此类的战略不感兴趣。

历史上唯一的全面成功的大规模区域化是过去两个世纪美国的出现和发展。毕竟 ,可以想象这一大陆——从阿拉斯加到佛罗里达 ,从迈阿密到加利福尼亚 ,从路易斯安娜到夏威夷——今天的样子 ,是否仍被英国和西班牙 ,法国和俄罗斯 ,印第安人和波里纳西人 ,和各种各样的欧洲移民组织 ,非洲和亚洲后裔分开 ,他们之间互相争吵不休。如果在这一大陆上仍然使用多种货币和语言 ,那么 ,美国还会是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吗 ?即使是有统一的语言 ,使用不同的货币会有很大的负面的冲击 ,因为通过在华盛顿州和他的两个邻居 :美国的蒙他那州和加拿大的可伦比亚省之间的贸易量的比较和资本的移动及人口的情况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 ,前者在这些方面要高得多。现在 ,如果美国的整个大陆不是一个合并统一的经济体制 ,它很幸运是在全球化进程的早期形成的 ,今天 ,它无疑也将是一个效益不高的市场 ,也不能如此成功地与西欧竞争。后者从历史上吸取教训并采取合并的道路 :语言保留不同 ,但至少一种共同的货币体系正已经形成。

区域化在世界的不同地方逐渐形成 ,一些中心正明显出现 ,然后向外延伸 ,就像石子投入水中引起向外扩散的波纹一样。北美 ,西欧 ,东南亚 ,拉丁美洲的南部 ,南部非洲 ,这些是 20 世纪初扩张的区域主义的最好例子。它的复苏是否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矛盾 ?绝对不会 ,尽管这个回答将再一次依赖于这一定义 :**日益繁荣的区域化发展和涵盖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全球化之间不存在矛盾。**如果全球化发展被理解为世界市场完美开放形式 ,每一地区的销售量

都是世界生产总量的一部分，同时需求的剩余空间由其它地方的供应来满足，那么，区域化当然不会被看成是它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它也不会阻止其发展。它依赖于不断加强的地区经济链——在投资，生产，金融和贸易领域——是否促进一个指定区域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相隔离(正如过去失效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即众所周知的 Comecon)，或相反，它是否导致或伴随合并的更高形式：不仅是在单个的国家之间，也包括在区域化合并的经济体之间。这一问题目前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面对下一轮 WTO 谈判(特别是农产品，金融中介，航空运输，电信业或建设服务)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加深的差异，一些国家不愿等待而是加紧构筑他们的区域组织的框架。

这样说来，世界范围的等级将经常被打破，以一种可能的全球自由贸易区域——一个不存在的和难以理解的 GFTA(全球自由贸易协定)——许多更小的执行不同贸易自由化水平和合并制度化到各种程度的组织出现和逐渐形成。然而，真正的发展(尤其是贸易动力和正在改变的地理结构)，正在进行的谈判和包含政治协议(比如，南北美洲之间的，或西欧和东南亚之间的)表明**某种程度上讲，现代的区域化是全球化的一个运输工具，而不是它前进的障碍。**要知道，从长远来说，这些过程是互相兼容的，相互推动，进一步促进全球化，也就是说，世界范围的区域化是必须的。因此，可以想象，WTO 谈判将加速进行，这个组织本身也将扩张到代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所有这些表明在一个正在合并统一的世界市场与区域合并过程之间不存在矛盾。相反，后者是前者的催化剂。竞争的加剧与正在进行的合并进程，可以很形象地证明这一点。在这一进程中涉及世界三大经济中心：欧洲共同体，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日本以及他们的最近的贸易、金融和投资伙伴，他们之

间相似，互相渗透和不断加深的合并统一。在所有三个中心市场，他们内部之间的、和任何一个与它的经济最密切组织之间，如：东欧与欧盟，南美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东南亚与日本之间，营业额增长最快（超过产量的增长，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他们与世界其它地区进行贸易的产量，包括剩下的两个经济中心，增长慢一些，但仍比产量增长要快。

谈到资本流动，更重要的，它们受不同的、难以预计的制度管理着，在这当中有些是纯粹出于投机而大规模移动的资金，只趋向于快速获取利润，而在目标地区生产力潜力方面没有任何实际的直接投资。资本流动——不象货物的移动，属于贸易关系的范畴——主要是直接进入最发达的经济领域。也就是说，在这一领域的难度比在国际贸易领域要大得多：它是一个需要一系列规则且一个相对稳定的市场，不仅仅只需要不断开放和完全自由化。

除去欧盟——跨国区域化最高形式，正在进行的合并的最先进聚集地，它的扩张从市场到制度到政策——许多其它地区的合并组织也正在扩张。参与国之间的经济联合力量各有不同，而是根据资本、劳力、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实际水平来合并。

许多国家就同时属于不同的组织，这表明合并在多方面，多种水平层次上展开。这种平行发展可能偶尔导致冲突，但它们往往简化了合并的进程，由此进入全球化。1989年APEC（亚太经合组织）在美国的促使下成立了，无疑表明是想从环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互相依存的角度上促进这一地区合作。另一方面，对美国来说，也是出于政治动机，目的是想保持，即使不是控制，与日本竞争，与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兴起的经济大国地位（以前是预期的，而现在是真正的），与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不断上升的影响和重要性的平衡。

许多区域组织的存在，简化了在各种不同国家的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这样逐渐失去了他们的国家特征而转变为国际性了。他们在贸易形式和金融联系及他们的制度合作程度上都有所不同。他们中的有些，比如，南美的 Mercosur，正加紧他们之间的合并联系，另一些仅仅是一些生产企业扩大贸易自由化，如南非的 SADC (南部非洲发展组织)，还有一些——如：中欧的 CEFTA (中欧自由贸易协会)，连一个邮政地址也没有。然而，尽管可能不全，目前来看区域规模还有局限，但他们所有这些人都是通过市场的合并来推进全球化。

APEC (亚太经合组织) 和 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顺便提一下，他们两个在目的、制度化程度和内部联系的强度上都不相同) 是两个可以援引来支持这一主张的组织：全球化不会太远，全球化进程主要通过区域市场的联合。地理分布和边缘政治仍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当前的趋势是合并的规模朝更大范围扩张，这也是一个事实。因此，下一轮长远的全球化进程将带来更深化的区域合并市场：NAFTA 与欧盟，APEC — SAARC，Mercosur 与 SADC，更重要的是，从长远来看，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将融合在一起。

到目前为止，贸易只集中在三个主要中心：欧盟，美国，和日本。比方说，墨西哥 76%的进口是来自美国。在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65%的进口商品来源于欧盟，只有不到 5%来自一样大的美国市场。反过来，墨西哥只向欧盟购买大约 10%的进口商品，向日本购买不足 4%的——正如所发生的那样，他的贸易伙伴来自 APEC。相反，ASEAN (东南亚国家联盟) 的成员国，还有中国和印度，在进出口方面的外贸市场上则显示出更大的多样性。从这方面来看，这些国家比法国或加拿大更全球化，更不用说波兰和乌克兰了。

这关系到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问题，它的发展正依赖这三个巨大市场紧密和全面合并的进一步扩大。这三个市场，在他们之间，生产出全球总产量的近60%。但是，这种合并只有到国际货币体制全面更新后才有可能出现。导致欧元，一种独立欧洲货币，产生的理由也可以适用于此。1999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罗伯特·A·蒙顿建议在这三个地区之间建立一种统一货币，因为这将是一个主要的促进全球化朝一个更新，更质变的方向发展的动力。这是历史车轮转动的方法，在全球化的早期出现过一种以黄金标准形式出现的单一世界货币起作用的时期——还挺有效的——，但现在这种现象又以一种新的状态呈现出来。

在一种单一世界货币建立之前（它将既是一种全球化合理的结果，反过来又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催化剂），领头的国家和经济组织应通过所建立的组织，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需要全面革新，协调他们的货币政策，在现存的货币体制的操作过程中进行斡旋。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承担全球金融大臣的角色，也不需要这样一个角色，但只要没有单一货币的存在，他就必须处理好在国际范围内的流通问题并保持世界主要货币相对稳定。这样一种货币的建立并再不属于纯虚构领域，但仍还有一段距离。

迄今为止的经验有些让人迷惑，因为在过去一个世纪盛行的趋势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导致大量国家货币的出现。最初，这是殖民体制跨台后的结果，当时几乎所有的新获解放的独立国家开始采用国家货币，于是在过去十年里，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共和国中有15个，前南斯拉夫有5个，前捷克斯洛伐克有2个）中建立了有21种之多的新货币，而只有三种保留下来（苏联的卢布，南斯拉夫的第纳尔，捷克斯洛伐克的克劳）。因此，在20世纪结束时，尽管出现全球化，仍有超过130种国家货币在流通——比世纪初的多好几倍。

根据所采用的定义和以下的解释，可以这样说：全球化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只处在起步过程中，尽管在其进程中存在高度发达的经济。这样一种怀疑的观点可以用经济和政治术语证明。

杰夫雷·福南克尔表示全面全球化应该是美国购买--按他们总的购买比例来算--一部分相当于外国生产商在全球产量所占份额的外国商品。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占世界生产的 25%，那么美国所购买商品的四分之三的应该是进口的。但是，美国对全球贸易的贡献只占 12%；全面全球化将需要美国对外贸易量（进口和出口）近六倍的增长，美国在外贸商品上要化去他们相当于在全球生产总量的外贸总收入份额的一部分，才能达到一个水平。这位作者总结道：我们远没有全面开放：在国内销售的产量份额与国内市场在世界经济的地位不成比例...换句话讲，按贸易比例来计算，全球化将需要再增长六倍，在它真正成为现实时，美国做跨世界贸易就象在美国国内做贸易一样。

这是很让人置疑的逻辑。除了少数几个例外，象香港和新加坡，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都是趋向于购买本国产品而不是外国产品。这里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主要的，简单的原因是加利福尼亚本地生产产品量巨大，而其他 49 个州，相对来讲，对加州销售量所做的贡献比他们对美国 GDP 所做的贡献要少得多。然而，这一点也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加州和新罕布什尔州——或者任何其它州——是完全与其它州合并的“美国化”的美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这一“美国化”的规模——通过使用单一货币和语言，依赖于共同的习俗和单一的商业法律，联邦政策的协调作用和共同的对外政策——是全面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这一认识上的“全面全球化”将永远不会达到，也不值得去追求。本世纪末一个合并的拉丁美洲或在将来一个遥远的时间里一个联合的欧洲的可

能形象会是一个到时适应于世界这个大整体的幻想。这一定义上的全球化，从一定的观点上看，意味着效益的下降而不是上升，可能会是一个荒谬的结果。

全球化的局限被效益的局限和通过不断扩张的市场和深化市场合并所取得的规模经济所制约。一个人可以提倡完全、普遍存在的民主，但如果要求通过一个平等、普遍的、直接的、世界范围内的选举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国会，则可能就太傻了；同样，没有必要产生假设理想的、全球性的市场，即使是作为一个参考也没有必要。**理想的全球市场是一个市场的汇集，在全球的每一个地方，相互之间完全和谐，没有阻碍地发挥作用，就象理想的民主在所有的国家都行得通。**当然，即使这样一种幻想都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无疑是值得追求的，值得渐渐接近的。

这样看来，一些市场将永远难以实现。一个绝对的、没有任何保留的完全开放，被运输费用或关税及其它即使在最开放的经济体制下也存在的贸易障碍所阻碍，但这不是唯一的理由。另一个主要方面是今天的世界，尽管全球化进程发展，仍是一个有着许多种货币和（有时）不合理浮动汇率的世界。仍然是一个有着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持续差异的价值体系的世界——将来仍然是这样的。

所有这些表明，考虑到产品的规模——和资本市场的合并，这一合并可能而且一定会被一个更好的和自由的贸易政策促进，那么全球化的合并仍存在很大进展空间。但也意味着这样合并将永远不是全面的。文化和心理因素将继续扮演一个合理的角色，它的重要性，即使是在世界最理性的时期，也不应低估。

4、我们需要全球化市场，但不需要全球化政府

有人要问，如果国内市场的职能必须要在国家政府的框架下才能实施的话，

那么以此类推，是不是只有建立了一个全球化的政府，全球化市场才能够充分发展起来呢？无疑，这种想法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罢了。

很显然，有人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他认为随着全球化市场的出现，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个全球化的国家。这个全球化的国家不仅拥有一个全球化的政府，也拥有国家政府的各种基本职能，包括国家的财政部门等。持这种偏激看法的人认为，这个全球化政府拥有对世界范围内的国家职能进行重新分配的特权，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调节及征收税收，可以决定国家的财政支出。但事实上，全球化并不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也永远不会朝这个方向发展。

只有制订了合适的政策及制度框架，能够适应在世界范围内对不同产品进行再分配的需要，全球化才能成功，也才能走向进一步发展。但全球化不可能走向“全部成功”，因为只要仍保持着以前的再分配形式，它就不可能赢得世界范围内所有居民的政治支持（现在说“世界村”还为之过早）。因此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制订一些制度、政策及战略计划来纠正全球再分配体系。虽然细节和技术部分还需要进行讨论，但进一步的全球化至少意味着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地区与最贫穷国家/地区的收入需要进行再分配，分配方式可以在国民经济范围内对最富裕与最贫穷的个人和阶层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因此，从政治以及技术专家政治上来说，有必要建立一个全球化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将富裕地区的部分收入转移到贫穷地区，以保证贫穷地区有能力进行再生产及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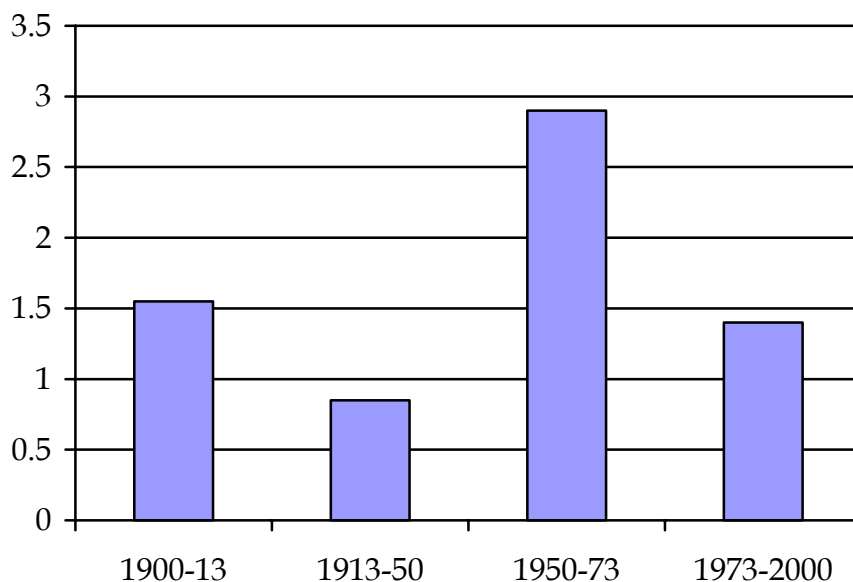
目前，尽管联合国要求富裕国家 GDP 的 0.7% 应该用于支援贫穷国家，但实际上这个比例仅有 0.24%，其中部分在资金转移的过程中已经用在了不同的组织和专家身上，尽管这些组织和专家的作用并不一定会对被支援国的国民收入有所裨益。因此，事实上富裕国家用于支援贫穷国家的资金最多只有其 GDP 的 0.2%。

从全球化角度来讲，这个比例至少应达到 1%，并且应形成一个合适的制度框架对这些资金进行再分配，以便为世界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性社会经济增长提供资助。但迄今为止，全球化的各个方面都还没有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一些国家的财富累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一些国家却变得越来越贫穷（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尽管这也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政府在进行私有化和非国有化过程中如果有大量的外资参与（正如 20 世纪 80 年代拉丁美洲的情形，或 90 年代一些后社会主义转轨经济，特别是俄罗斯的情况一样），但并不能吸收外资储蓄以促进经济发展，反而使资金外逃到其他富裕国家；或者开放的金融市场使国内企业或家庭的储蓄从贫穷的国家转移到富裕国家，这些情况如果长期存在势必将影响本国经济的发展，也是无法令人接受的。

上个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各行各业的人们收入都有质的增长，但要在如今全球化的阶段达到这种质的增长却仍然还是一个梦想。在 19 世纪初，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第一次能源危机爆发，也就是 1973 年间，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飞跃，社会主义经济和后殖民经济也获得了迅速发展。在这个阶段，尽管世界人口急剧膨胀，人均 GDP 每年仍达到了 3% 的增长率。从 1973 年到 2000 年间，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下降了一半多，每年仅有 1.4% 的增长率（见图 1）。

二十世纪全球产值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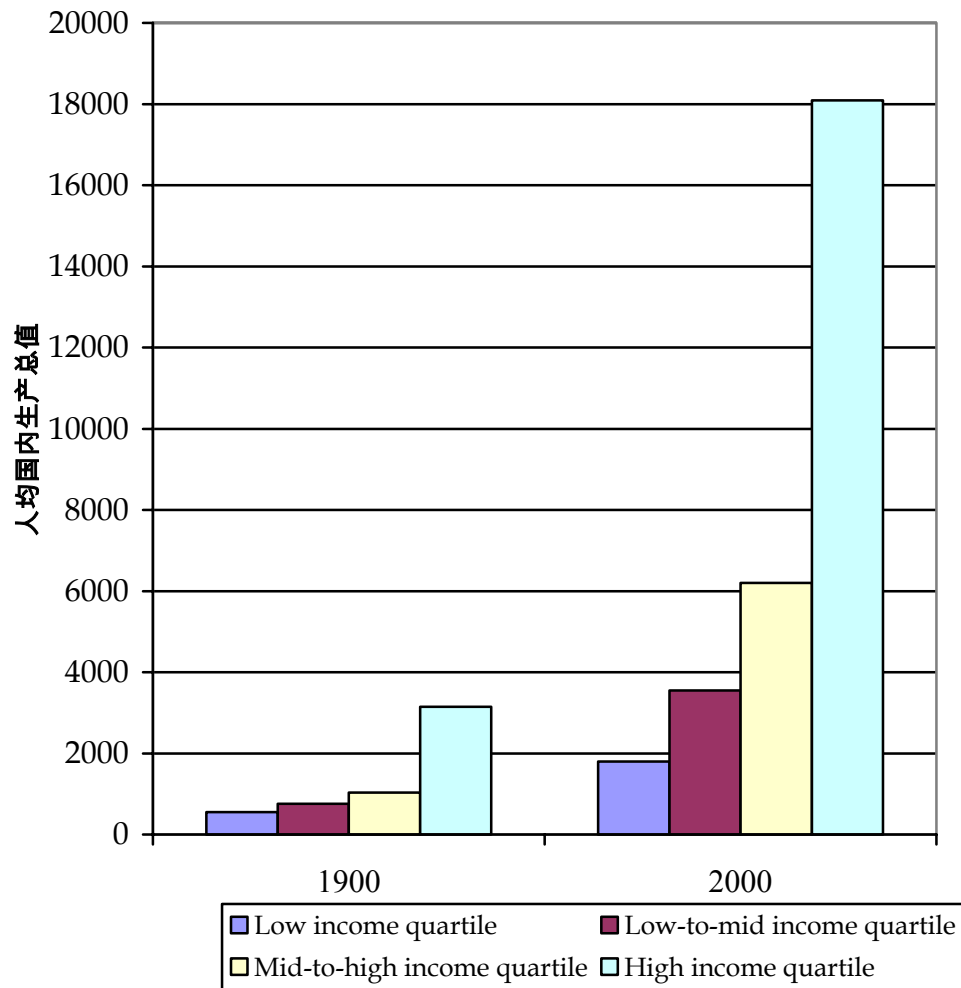


由于 20 世纪世界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我们再次重申, 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经济增长最快的阶段), 人们的经济收入也得到了稳步提高, 20 世纪末的贫穷人群与上个世纪相比, 不仅收入上有了质的变化, 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 他们过上了比 100 年前的富人更富有的生活。

如果将世界人口以购买力水平由高到低平均划分为 4 个群体, 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群体, 2000 年世界第二群体的平均收入比 1900 年世界最一群体的平均收入还高出 2 倍有余, 这些数据尽管令人吃惊, 但确实是不争的事实。同时, 第一群体的平均收入比一个世纪前已高出数倍。因此, 虽然第二群体的物质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大幅度提高(平均收入从 1900 年的 1200 美元左右到 2000 年的 6000 美元左右), 但它与第一群体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从 1900 年到 2000 年, 第一群体, 也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 25% 的人群, 他们的年均收入已经猛增到了 18000 美元。得益于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四群体, 也就是世界上最贫穷的 25% 的人

群，他们的平均收入如今已超过了 1900 年最富有人群平均收入的一半，这表明一个世纪来人类的经济增长有了巨大飞跃，尽管许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见图 2）。

二十世纪初期和末期的收入水平*



尽管人们的收入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应将此归功于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相反，他们对全球化的疑虑逐渐增加。其原因就在于尽管经济飞速发展，但过去一个世纪来世界上贫穷人口的数量并没有减少，甚至可以说大大增加了。目前，世界大约有 11 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 1 美元，几乎

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另外，过去 100 年来世界各地人们收入的不平衡也大大增加。随着全球化的加快，人们收入的差异性也继续扩大，这在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自然联系。但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因素可能导致贫穷及收入分配差异的产生，其中有些因素与全球化并没有任何联系：如由于统治阶层的腐败或当地武装力量的冲突而导致的贫穷或收入差异等。

1960 年，随着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以及殖民主义的瓦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不得不以某种方式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适应。那时，世界上 20 个最富裕国家的人均 GDP 是 20 个最贫穷国家的 18 倍。到了 1995 年，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达到了 37 倍（世界银行 2000 年数据）。现在，这个数字可能已超过了 40 倍。这表示，包括全球化在内的一系列因素促进了人们收入的增加，但同时，也包括全球化在内的一系列因素更快地促进了收入分配不公和不平衡的增长。

的确，如果全球化没有发展到现在的阶段，许多国家不可能获得那么多的财富；但同时，许多贫穷国家也不可能背上那么多无法偿还的债务。因为这些国家的政策不力、市场制度及民主结构毫无效率，它们不是将借得的资金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上，而是通常浪费在军务的开支及腐败上，因此，毋庸置疑，这将大大导致这些国家债务的增加。顺便说一句，在债务国家看来，军务上的开支过去乃至现在都没有什么作用；但债权国却认为他们帮助债务国进行了军务建设。如今，全球化在这方面带来的唯一变化是开放了武器市场，一些国家在这个市场上根据不同的规则可以自由地购买及出售武器，但其他国家由于政治因素对这种买卖武器的自由则持反对态度。

关于最贫穷国的债务，可能最终不得被取消，这不仅是基于人道主义和社会的原因，也是由于经济原因和纯技术的原因，很简单，这些债务可能永远都收

不回来。最近，由于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努力，如 Jubilee 2000 和 Oxfam 等，债权国政府同意减免 HIPC 集团（高负债贫穷国家）的部分或全部债务。如果不采取这一措施的话，这一集团的许多国家都没有机会以创造性的方式参与全球化，也无法获得全球化带来的利益；他们只能作为富裕国家的工具来感受全球化，而无法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融入全球化。

我们认为，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NGOs）的影响日益增加，这也成为如今全球化一个新的重要方面。与国际政府组织不同的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他们完全独立于政府，同时不理睬来自跨国公司的压力。这样，一个新的伙伴进入了国际舞台，而它的重要性也将会迅速增加。在一些事务上，如最贫穷国家的环境保护或债务减免问题等，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为社会进步作出越来越有力的贡献，而对独立媒体和互联网的熟练运用将使他们在国际上产生更大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全球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伴随着全球化国家、政府及政策的产生。但即使没有全球化政府，各种各样的摩擦、世界范围和地区内的危机确实也在不断产生。象莫桑比克这样的贫穷国家以及象俄罗斯这样资源丰富的大国，国内无法处理的债务都在不断增加。机会正在白白浪费，世界需要一个更有效的资源分配体系——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外部干预，市场体制本身是无法解决的。最糟的是，不平等及不公正等问题正在增加，最终这个世界将不可避免对此作出回答：是以一种逐步发展的方式，还是以一种大变革的方式，也就是说，是采取有计划性的、协调的行动还是无计划的、无序的行动来处理这些全球问题。

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尽管存在着国家和政府，国民经济也有可能产生危机及无序发展，从而影响再生产。这些后果也表现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

的不公正等，而后者这种社会现象是很难消除掉的。因此尽管全球经济没有受到国家或政府的控制，它可能会发展得很好；反之，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可能会由于当时政府的不善管理而举步维艰。或者，事情也可能朝着另一方面发展：全球经济可能因为缺乏全球性的经济协调而陷入困境；而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可能会稳步发展，因为这个国家恰好有一个有力的政府。这两种情况中最重要、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政治学，即协调和制度。有了这两者，即使没有国家框架，没有全球化政府，全球化市场仍然可以顺利发展，就象全球贸易没有一个全球贸易部长也能发展一样。况且，在任何情况下，没有全球化政府也不会阻碍这种发展。因为，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过程是遵循它内在的逻辑规律而自然发展的；另一方面，没有政府，也就没有官僚主义来限制市场的扩张。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作出结论：在现在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如果没有基础性的变革，世界经济也可能高速发展，持续繁荣（世界经济如今分成了几大部分：200多个国民经济、10-20个大的经济集团、贸易协议及联合组织，这些组织内部都由不同的经济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实现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及平均分配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不是要组成一个全球化政府，而是要实施全球化政策，以及对区域及国家政策的协调。也就是说，必须要为全球金融、贸易、环境和社会政策各方面的协调及满足这些方面的要求提供一个合适的制度框架。**

因此，全球化问题也是一个政治性问题。如果超国家决策及机构改革没有遍及几乎所有国家，那么势必将影响到现代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描述这个问题：如千禧年会议讨论的WTO框架内的市场开放，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结果；布雷顿森林会议所提议的货币金融政策主要是服务于西方7国的利益，因此并没有改变国际金融秩序；还有2000年12月在耐斯举行的欧

盟峰会所形成的决定，无法满足面临的挑战要求。所有这些形成了国际经济制度秩序的不同方面，其中的主题就是——全球化。

全球化市场呼唤全球化政策，反过来，全球化政策要求世界经济政策制度化。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也不应低估目前已经取得的进展。如果没有制度化，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事实上的确如此。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规则，但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组织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准备、实施及执行这些规则。目前，在地区范围内（如：在欧盟各国内实行统一税收）及全球范围内（如：防止温室效应）都已经产生了许多问题。

今天，全球化已经有了大量的倡导者，他们包括经济学家、政治家及一些学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上一个时代一些过度行为的强烈反应，是与那些行为截然相反的措施。如今，孤立主义和恐外主义、民族主义及保护主义、狭隘和地方主义已经过时，因为许多人都已知道这些只会带来麻烦和敌意，而不是成功和欢乐。一些闭塞（或相对闭塞）的地区也已了解到这一点，它们发现这正是导致自己落后的原因，它们也将由此失去很多机会，因为这些机会只会给那些开放的、付出并获得回报的、互相融合的国家 and 地区。这些看法和意见极大地影响了全球化途径，不仅对政治家们产生影响，也对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产生了影响。事实上，通过思想、信息、知识、经验及商品的交流，在更大程度的开放及融合的环境下，人们的思维空间大大扩展了。因此，越来越多思想敏锐的人们表示他们将支持进一步开放，也就是进一步全球化。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避免出现另一个极端，因为全球化同时也伴随着一些有害无益的社会发展及不良现象的出现，引发更多更激烈的反对意见，包括产生许

多持不同政见者到发生街头骚乱等。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以上提及到的社会财富及收入分配的不公,更重要的是由于政府制订的政策无力制止分配不公这种社会现象的存在。因此,如果国际政策,尤其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政策的制订者们注意到他们制订的政策仍未产生任何作用的话,反全球化观点的产生将使他们认识到这一点:全球化政策不能对人类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从而终止全球化进程,或令全球化进程倒退,它应该是最合适人类发展的政策,才可能带来最好的结果。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不需要一个全球化政府,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协调的全球经济政策。这也是 21 世纪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5、后社会主义的转轨

后社会主义系统化的转变是一个历史性进程,它是从以国有企业为主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逐渐向以私有企业为主的市场经济过渡,从以中央调控的社会主义经济向自由的、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经济过渡。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还是社会和政治的转轨过程。从经济上来说,这种转变由 3 个平行的、有内在联系的过程组成:

----开放及宏观经济的稳定;

----制度建设;

----微观经济改革。

只有当以上 3 种过程同时进行,我们才能看到一种系统的转变,也就是新的体系取代了旧的体系。如果只有一种或两种过程发生,则只是现有体系的改革,而不是对旧体系的废除。相反,通过提高经济生产效率,可以赢得对旧体系的普遍支持,从而使它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方法以前南斯拉夫曾采用过,后来匈牙利

和波兰也采用过，前苏联的最后几年里也实施了这种方法。这些事情都是在 1989 年前发生的，1989 年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尽管在此很久之前社会体系就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并且，无论是从制度方面还是行业领域来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早期改革都占了转轨过程的很大一部分。一些转轨国家，如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在前 10 年所获得的成果绝大部分要归功于它们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的市场改革。波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尤其是 80 年所实施的改革措施对后来进行的经济转轨大有裨益。正因为如此，尽管在 90 年代早期出现了严重的概念性错误，实施了不当的政策，过渡期出现的经济衰退才没有持续多久。经济衰退仅持续了 3 年，波兰开始实施市场机制，早于其他没有进行改革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如前捷克斯洛伐克或保加利亚等。

我们可以对转轨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进行分析，包括从社会体系发展进程的连续性和变化性这一角度进行分析。我们应该注意到“系统转轨”这一说法并不适用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从 20 世纪早期——凯恩斯认为那是一个越来越有效率的全球化市场，而列宁认为那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贪婪的帝国主义——到 21 世纪初，此时我们都从全球化角度来看待这个体系。这“两种资本主义”都是世界的一部分，从一种到另一种的转轨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自然现象。个中原因就是这些转变都是以一种进化发展的方式发生的，尽管中途也发生了一些突发性中断，如 1929-32 年的经济大萧条、193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73-77 年的能源危机，但总的来说是连续性大过变化性。更准确一点说，制度连续性是主要因素，伴随着社会模式的不断进化，以及更为细致的制度运行，因此几乎没有出现变革性的转变，后社会主义的转轨正是这种情况。

然而，在后面的例子中，不管是在那些以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进行系统变革的国家中（如罗马尼亚），还是在那些旧体系的背景下就已出现了新体系的萌芽、并且已经为新体系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环境的国家（如波兰），连续性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由于现阶段全球化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因此我们应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谈连续性问题。目前，**我们不仅无法预测转轨将于何时结束，甚至连它确切的开始阶段都未能确定。**这类疑问与“转轨”的定义有所关联。

有趣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00 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年度评估报告中将中国（还有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列入与中东欧和前苏联一样的转轨国家。更有趣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因此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国的系统转轨早在 1978 年就已经开始了，而越南和老挝的转轨也在 1986 年开始。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认俄罗斯的转轨在苏联时期就已启动（1986 年未完成的改革措施），以及波兰的转轨开始于 1982 年（军事法的公布及随后的一揽子经济改革），那么这种说法也许不会引起太多的异议。还有匈牙利呢？按照上面的说法，难道我们不应该将匈牙利的转轨开始时间追溯到 1968 年吗？而前南斯拉夫也许甚至可以追溯到 50 年代？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最好对中国的例子进行一下探讨。中欧、东欧及前苏联国家在经济转轨大萧条的打击下，GDP 比 1989 年的水平平均下降了 30%，而在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却获得了快速增长，产量翻了 1 番，在国际上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在这个国家进行的转轨进程对整个转轨经济和全球化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毋庸置疑，在迈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比许多后苏维埃共和国都走得更快。土库曼斯坦是转轨经济吗？当然不是。它在 2000 年的开放程度和市场制度

建设还比不上 1989 年的波兰。我们最好将土库曼斯坦和其他一些国家，如阿塞拜疆或哈萨克斯坦，称之为改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考虑到地理政治因素，有的国家可能不愿意进行转轨，但转轨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象“地球引力”一样，任何绕着地球运行的物体都必须向着同一方向运行。中国也不例外。当然，中国改革家们并不愿意废除社会主义制度，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这样认为），但他们实施的是转轨经济，并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取得了这种成果。

换句话说，转轨的连续性从来没有停止过。当一种社会体系进入了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再是继续改革，而是一个更先进的转轨过程的开始，这就是连续性所产生的影响。以前我们没有注意到所经历的一些事，但现在却成为“过去”。“现在”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由于已经进行了长期的转轨过程，我们相信这个社会体系正坚定不移地朝着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中国的改革没有从这个方向开始，但这是它最终要到达的目的——也许甚至比那些市场化进程看起来要快的转轨国家更快。

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的另外一个有趣现象。中国的转轨不仅是经济转轨，也是政治意义上的转轨，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向一个开放的市场过渡，也是向议会民主和城市社会过渡。这就引发了市场化和民主化两者之间能否兼容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问题。一些评论家们宣称——这又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后社会主义转轨暗示了民主的实施是转轨过程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应该获得肯定。如果真的接受了这种观点，那么中国的例子就不再是转轨的发达形式，而只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正在实施的先进的市场改革。顺便提一句，到现在为止，这种改革已经比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在 80 年代末进行的改革走得更远。

但是，如果没有民主国家和城市社会的制度，从长远来看，市场经济不能在全球化经济中有效地发挥作用，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也是真的。这正是我们应该从智利、印度尼西亚、韩国、台湾这些国家或地区过去的经验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在不同的情况下（非后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民主变革的是开放环境中市场制度的成熟度。民主变革有时候可能会妨碍经济改革，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经济改革，因为除了自身价值以外，民主作为一种文明工具，可以纠正自由市场及其市场机制中出现的过度行为，这一点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时间可以见证一切，包括中国的民主。一旦建立了民主制度，它将支持市场经济的制度实施，这将会（或者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

简单地说，中国现在只是正在进入转轨阶段，因为市场经济在那个国家如今正处于萌芽状态，将来某一天，市场经济将不可避免及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如果某人出于简化国家分类的目的，愿意推断中国的转轨进程在约 1/4 个世纪前就开始了，这也只是一个惯例问题，不是科学问题。许多提议可能会获得普遍赞同，但只有少数能够被予以证明。

从全球观点来看，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成熟的后社会主义转轨经济，这要得益于全球化进程（越南、以及一些后苏维埃共和国也进行了全球化进程）。这些国家也渴望参与世界经济交流，并从信息、技术、资本和商品的交流中获益。这种参与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象经济特区或汇率双轨制这种替代政策或制度如今不能再实施了。今天，我们不可能不按照资本主义形式来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即使一些国家（现在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较长的时间去了解这个真理（象白俄罗斯直到现在都没有彻底了解），但它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走下去，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也将建立一个有效

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因为市场经济各有不同，所以转轨也将带来不同的结果。尽管没有哪个国家的转轨会注定成功或失败，但有些国家确实比其他国家的机会要好，如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好的客观发展因素，有更好的地理政治环境等（从这点上来讲，很难想象一个转轨国家的经济状况会比波兰更好或者比马尔代夫更糟）；另外还有前面提到过的，转轨开始之前在计划经济下进行的制度改革程度，这也是以历史遗产形式出现的客观因素，但在那时需要时间为将来的转轨打下基础，改革所取得的成效也不尽相同。波兰的改革非常成功，但罗马尼亚的改革却不尽如人意；匈牙利改革的效果也非常好，但阿尔巴尼亚的改革就很失败；苏联的一次性改革没什么意义，但中国的改革成果至关重要。如今，我们都能很清楚地看见这些国家的改革结果。

然而，最重要的是，转轨成功是由政府所实施政策的质量，尤其是运用发展战略协调系统变化的能力所决定的。这两者是经济行为中两个截然不同的主体，需要寻求适当的理论支持，以保持这两个主体的独立性。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体系（或不管转轨进行到什么程度），在这个体系框架内总是可能实施更合适的或更糟糕的经济政策。在波兰，1994-97 实施的政策被 1998-2000 政策所取代，而后者无疑比前者要糟糕的多；而在俄罗斯，这个顺序被颠倒了过来，1993-98 实施的政策明显不合适经济发展，但 1999-2000 政策有了很大改进。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波兰正是由于政策变换不当才导致经济增长率的急速下降，造成国家财政恶化，打断了外部经济平衡。由于这些不正常的经济现象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从而也导致了腐败或有组织的犯罪的增加。而在这个时候，俄罗斯的这些类似问题已经逐渐减少，国家预算状况有所好转，经济产量也获得了明显增长。

由此看来，全球化是转轨的强力催化剂。现代技术变革、政治变幻及经济知识引发了全球化；反过来，正是由于全球化的影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近来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否则，如果没有占世界 1/4 人口的世界第六大洲，怎么能够称为全球化经济？如果不对这块土地的自然资源加以利用，不进入这个有巨大潜在需求的“市场”，又将成为哪一种世界经济呢？但要利用这个成熟的市场，必须要经过这个转轨过程。因此，其他国家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措施，以确保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进程以适当的形式并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并符合国外经济作为投资者和制造者的战略利益。

这种做法能推动转轨进程，同时也造成一种风险，那就是前社会主义经济将被一种不是那么时髦的社会市场经济所取代。但可能也会有一些例外，只要中欧和东欧转轨国家已经意识到必须要形成国内资本市场及采取各种制度来激励国内企业发展，并且已经实施了相应的改革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措施，则这些国家可以申请加入欧盟来避免出现这种风险。但是，大多数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独立，与当地利益集团和寡头组织有紧密联系的国外资本占据了市场的统治地位。尽管中国在资本化过程中迄今为止还没有这种趋势，但许多转轨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普遍存在着这种有利于富裕国家利益的后社会主义资本化。

到目前为止，在转轨进程中也显示出国内外利益集团之间联盟所带来的破坏性作用。这些利益集团将转轨带来的变化资本化，尤其是与私有化及贸易自由化相关的变化，以及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所带来的变化等。最能描述这种情况的当属 1997 年阿尔巴尼亚产生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大大损害了阿尔巴尼亚的经济，造成国内局势动荡，最后不得不借助国外的军事干预才维持了国内秩序。这次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就是，相当于阿尔巴尼亚国内 GDP（顺便说一句，阿尔

巴尼亚的 GDP 是欧洲最低的) 的 60% 的资金已被挪作他用 , 其中大部分流失到了国外。

这也许只是个别现象 , 但任何一个转轨国家都有可能重蹈覆辙。每个国家实施的市场制度不同、民主的成熟度不同、公众生活的总体质量不同——尤其是媒体的参与程度有助于遏止经济危机 , 那么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及可能造成的后果也就有所不同。

转轨国家不能依靠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 , 因为事实上它不可能让后社会主义经济获得多大好处 , 它只能让转轨国家的部分政治家们从中得益。匹兹堡大学人类学教授 Janine R. Wedel 女士曾在许多转轨国家工作多年 (90 年代早期曾在波兰工作 , 但其他时间主要是在俄罗斯工作) , 她对这些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给予了严厉批评。正如她指出的那样 , 世界各国精英们的关系已越来越紧密 , 但他们与自己国家之间的联系却逐渐消失 , 这部分人将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俱乐部的成员 , 而不是 , 如 : 美国人或俄罗斯人。

很遗憾 ,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 虽然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将此认为是一种极端情况或过分一般化 , 我们也不应低估这种情况所带来的威胁。这种现象不是一种行为准则 , 也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这种行为及现象在转轨国家普遍存在 , 并将给这些国家的转轨进程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它们将削弱经济增长能力 , 降低对改革的社会支持程度 , 并将在转轨进程中增长反全球化情绪。尽管没有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 就不可能产生这种现象 ,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谴责全球化 , 事实上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部分政治经济精英们的欺诈行为。这其中的原因众多 , 但主要还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缺陷及国家领导人缺乏根除这种现象的决心所造成的。

全球化和转轨的同时进展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正逐渐进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后社会主义国家。目前这部分国家的经济制度非常薄弱，资金缺乏，因此它们对那些制度成熟、资金充足的国家依赖性很大。也正因如此，一个单一的、互相融合的世界市场形成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正变得日益清晰。这与“世界只有一个，但存在不同情况”的事实并不冲突。举个例子，正如在一个优雅的时装店，有人是老板，有人是时装供应商；有人是富有的顾客，有人只是一个橱窗浏览者；甚至还有人只是一个地板清洁工。

那些相信系统转轨将带领它们迅速从“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进入“第一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接受一种更为现实的道路，即从“第二世界”进入“第三世界”，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第三世界”已易名为“新兴经济”，这条道路对于转轨国家来说应该是一条更可能实现的道路。

这意味着，一方面，从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这两个方面来说，全球化限制了转轨经济的自由。因此，转轨国家的经济政策必须要考虑到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传达给它们的全球要求；并且，希望加入欧盟的转轨国家必须要符合欧盟的制度标准，这种情况作为“经济事务自然国”这一说法正被许多国家日益接受，否则，任何拒绝进行自由国际贸易及不允许国外投资的国家都将走向失败。

另一方面，在任何情况下，全球化都不会使制度安排及政策统一化。至少在目前不会如此。关于国家经济和社会的重要问题，政府还有很大的空间对此作出决定。因此，无论如何政府都应对本国国民经济承担责任。

全球化给后社会主义经济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然而，为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至少必须符合两个条件。其一，在转轨早期，转轨国家不能失去经济主

权，不能对国家的再生产造成影响；其二，转轨国家需要一个合适的制度改革方案，以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以便更好地利用全球化“全天候”进程，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许多转轨国家都没有达到这两个条件，其原因或者是由于对外部经济的过度依赖，也或者是由于缺乏合适的经济政策所致。

不可否认，任何一个后社会主义转轨经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都会大量借助于国外资金，因此这些国家很快就会负债累累，有的甚至超过它们目前乃至将来的还债能力。从阿尔巴尼亚到乌克兰再到俄罗斯，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或多或少都陷入了这种债务陷阱。与此相反，中国这个最大的转轨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以来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从来没有放弃对自己经济的控制权，因此避免了转轨危机的产生。

转轨国家在债务缠身的情况下别无选择，唯有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否则它们将被迫撤离资本市场。虽然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助的障碍并不存在，但在实际操作中，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之前，转轨国家无法做任何事。因此，要获取必要的国外资金援助，转轨国家必须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一揽子“稳定”条款，这些条款是基于《华盛顿协议》的结构改革政策。如果这些一揽子条款能帮助转轨国家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国内经济局面可能会好转。但不幸的是，事情并不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在所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也包括世界任何地方——外部政治、制度和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尤其是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作用及它们对转轨所产生的影响，尽管这两个机构的职能差别很大。一些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快，而另一些国家的发展却相对较缓，这并不是因为它们采用或没有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它机构的建议，而是取决于它们自己经济政策的好

坏。

虽然我们都清楚历史的遗留及地理政治状况都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这个国家所实施政策的质量，当然，外部世界可能也会给予资助，但外部世界可能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这样看来，国民经济政策是主要因素。当然，一个好的政策只能建立在一个好的经济政策之上，仅有好的理论是不够的。因此，经济转轨的成功主要取决于政治转轨以及人力资本和文化变迁的质量。

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正在成形的全球市场集所有市场的优点于一身：分配效率高、能很好地适应再生产的各种状况、对经济的敏感性强等。但它也具备了所有市场的一切缺点：失业、消极的外部影响、收入的过度失衡、将部分人群从生产和消费中排斥在外、由于缺乏稳定性可能导致生产和经济危机等。转轨可能会带来这两种结果，但全球化又给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及风险增加了新的注释。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外部世界，亦即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政策仍然对进一步的系统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直以来，技术进步和新技术的产生使发明者/技术拥有者更富有竞争力，这在如今的信息技术时代更是如此。因此，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发明，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

全球化给转轨国家吸引国外投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将提升转轨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并从世界市场获得更多的好处。因此，制造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来弥补由于转让新技术及废除旧技术所造成的工作损失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举。

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制度成熟，经济环境稳定，分配效率明显提高，再加上

以上这些正确措施，则通向经济成功的大门就打开了。这样，一些后社会主义国家赶上今天世界上最富裕国家也只是两代人的问题。由于以下三个独有的因素，在人口最密集的两大洲有相当一部分人现在都获得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

----第四次工业革命；

----全球化的现阶段；

----第一次后社会主义革命。

有些人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次机会，而有些人将错过这次机会。但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将要做什么。

6、历史的开始

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历史的结束，而是历史的开始。现在，最终几乎每个人都将参与历史的创造之中。至于怎样创造，我们将拭目以待。毕竟，我们前面还有整个新千年的时间。